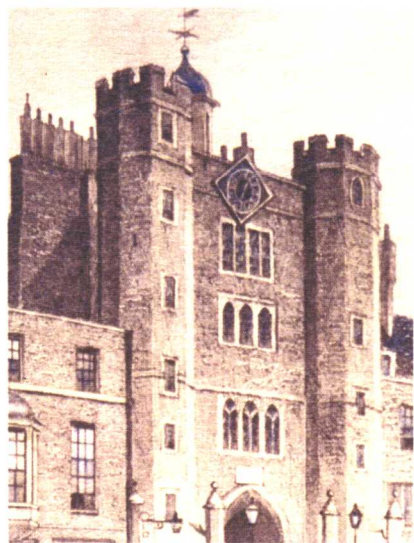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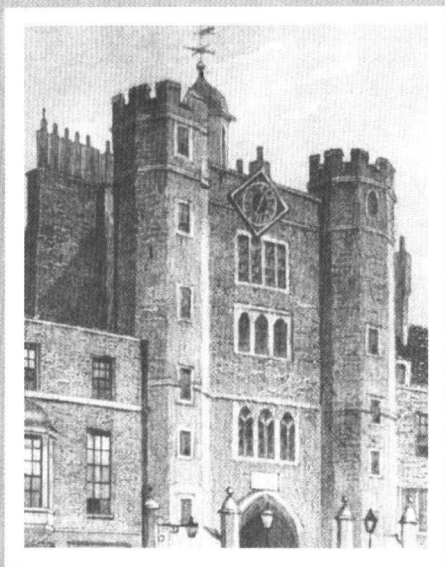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新旧历史学

[美]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 著

余 伟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新旧历史学

[美]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 著

余 伟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旧历史学 / (美) 希梅尔法布著; 余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225-245-5

I. 新... II. ①希... ②余... III. 史学史—20 世纪—文集

IV. K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0554 号

新旧历史学

(美)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 著 余伟 / 译

责任编辑: 刘 刚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64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5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245-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献给希莉亚和哈罗德·卡普兰
(for Celia and Harold Kaplan)

过去才是充满生气的，它渴望着挑动我们，刺激并侮辱我们，引诱我们去摧毁它或者重新粉饰它。人们想成为未来的主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改变过去。他们艰苦奋斗就是为了进入那么一间实验室，在那里照片可以修饰，重新着色，在那里传记和历史都可以改写。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1〕

〔1〕 Kundera, Milan,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参见莫雅平译：《笑忘录》中译本，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译者注，以下脚注除特殊说明外，均为中译者注。

目 录

修订版导言	1
第一版导言	4
第一章 新新史学:后现代主义	17
第二章 旧新史学:“撇开政治的历史”	34
第三章 心理史学与计量史学	55
第四章 作为社会学家的历史学家:两个民族或五个阶级	70
第五章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小组”	95
第六章 作为精神分析家的历史学家	122
埃德蒙·伯克:一位矛盾心理的保守主义者	123
詹姆斯·穆勒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矛盾心理的叛逆者	129
第七章 社会史回顾	138
一位饱经风霜的父亲的反思	139
恢复一个古老的世界	145

第八章 民族史学是过时的吗?	152
法国的法国性	153
英国的英国性	164
世界主义的幻象	174
第九章 现在谁读麦考莱?	180
第十章 重访修正主义:泰勒模式史学	193
第十一章 历史与进步观念	211
第十二章 历史言之有理吗?	228
第十三章 历史终结了吗?	244
后记 1999	249
注释	252
致谢	294
人名索引	296
书刊与组织机构译名表	308
重要术语译名表	314

修订版导言

自从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 17 年了,而把社会史界定为新史学的那篇前瞻性文章的发表,也已经有 20 年了。17 年,或者 20 年,在历史的进程中和历史学家的意识中,一度被认为是一段短暂的时光。然而,当历史本身在近 20 年里加速——现在的几十年就像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区别十分强烈——的时候,历史著述也在加速。过去有段时间,备受尊崇的史学著作,须在事件被记述下来以后的一代或数代里,方才能被动手写作,这被认为是在通过时间以使档案得以公开,客观性得以显现。今天,历史学家们致力于那甚至尚在演变中的事件,由之,常常使得历史学家们成了那些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古老的格言表明:“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人们也许修正它:“历史是现在的政治,‘撇开政治的’历史是真正的历史”。

“新新史学”[*new new history*]——有着好几个种类的后现代主义——就像传统的旧史学不同于新史学一样,是完全不同于旧“新史学”(社会史)的。当本书初次刊行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尚是一个相对生僻的概念,历史哲学家们要比史学专业人士知道得更

多。滴漏理论^[1]在经济学中也许对,也许不对,但它确实适用于文化。仅仅在几年间,后现代主义(或者如它为人熟知的,简称“pomo”)就在学术界,且此后没几年又在传媒业界,成为了主流。当埃德蒙·莫里斯^[2]在1999年把虚构人物和逸事引入到他的里根传中,许多评论家给他的作品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而没有感到有必要去界定或解释一下,他们用此术语意指着什么。

到如今,在学术界,如同传媒业一样,这个词已经变得有点走味了。但是正如我近来在撰写一本论启蒙运动——或者“启蒙方案”,就像它现在被称呼的那样——的书时所发现的,现实依然未变。今天,不可能专注于这一主题,而不首先反驳后现代主义者们的异议,他们否认启蒙运动的特殊观念,他们认为它是现代性的一个幻象,和那些与之相关的“理性”、“本质”、“权利”、“进步”的概念一样,是非实在的,而这些概念现在都被反讽地加上引号使用。

于是,“新新史学”不再是那么新了。某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已经在倡导一种还要更新些的新史学,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 modernism],它的轮廓依然是不清晰的。同时,旧新史学的某些先行者,正在退却至一种还要更旧些的史学,呼唤着叙述的和政治的历史学的复归。在我的初版导言中,我含糊地表示相信,只要有对新史学厌烦了这个理由,旧史学就将重申自己的权威,而且历史学家们将再次发现他们在“事件的戏剧、观念的力量,和个体的尊严”方面的热望。今天,至少在美国,那一复兴有着诸多的证据,不是由于厌烦,更确切地,是因为对我们自己过去的重大事件和伟大人

[1] trickle-down theory,又译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这被称作是“涓滴效应”。由此还有“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

[2] Edmund Morris(1940—),著名美国作家,1980年以传记《西奥多·罗斯福的崛起》一举成名,获普利策大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荷兰人:里根传》创作历时14年,于1999年10月出版。

物的再度感兴趣和崇敬引发的。是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们,而不是圣徒传记家们,使得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和“伟大的解放者”^{〔1〕}成了畅销书榜上的常年主打书。我确信,这一经验将缓慢滴入(或者渗到,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大学中。

我加到当前版本中的四篇文章——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它们全都还在,而且发展势头良好。¹ 把它们拢在一起,回忆起它们中的某些何时依然是新的,看看它们彼此是如何侵犯的,并且仔细考量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前行的,这也许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历史的终结”,就此短语已被用着的意义而言,无疑没有历史著述的终结,而且也没有历史学家寻求了解过去——由之,不言而喻,现在——之意义的方法的终结。

2004 年

〔1〕 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指美国的开国元勋,如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伟大的解放者指林肯总统。

第一版导言

3 “旧新社会史”[Old New Social History]与“新旧社会史”[New Old Social History]:因之,一位杰出的社会史家(查尔斯·梯利)把他的史学模式与另一位杰出的社会史家(劳伦斯·斯通)的区别开来。¹回顾这一流派的历史,人们也许会受骗,加上某些额外的“旧的”[old's]和“新的”[new's]字眼,以便适应那自从詹姆斯·哈维·鲁宾逊宣告“新史学”来临以来出现的几种类型。

即使在1912年,当鲁宾逊发表那份宣言的时候,“新史学”也是一点不新的。旧史学的堡垒《美国历史评论》,在1898年刊行了一篇题为“新史学诸特征”[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的评论,赞扬为卡尔·兰普勒希特所践行的“新”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其本身也不是那么新的,雅各布·布克哈特论文艺复兴的经典著作^[1]几乎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问世了。兰普勒希特的新史学并不全然是布克哈特式的;鲁宾逊的也并不是兰普勒希特式的。但是,它们彼此,且与新史学的后续版本有着许多共同点,因为它们全都抛弃了旧史学的基本前提:历史的正当主题本质上是政治

[1]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的,历史著述的天然模式根本上是叙述的。兰普勒希特的“源始”模式^[1],强调了原因而不是叙述,预兆了今日备受宠爱的“分析”模式[analytic method]。“普通人”的历史学,将省却掉历次战争和历朝“微不足道的细节”,而利用“人类学家们、经济学家们、心理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的研究结果,鲁宾逊的这一主张至今仍是新史学的议程。²

英国有着它自己的奠基人,J. R. 格林在他的《英国人民史》(1877—1880)中,声言要把“英国人民”而不是“英国诸国王或英国的历次征服”作为历史的主题,而且比起西班牙无敌舰队来,更为关注伊丽莎白女王的济贫法^[2],较之詹姆士二世党人的主张,对卫斯理宗^[3]要更有些兴趣。³此后不到半个世纪,威尔斯以《世界史纲》的形式,宣布了一种非维多利亚式的且不虔敬的新史学版本,在此版本中,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世界历史的”形象被发现是昂首阔步于历史之巅,活像“一只粪堆上的小公鸡”。⁴坚决地使历史民主化,且又揭穿它的真相(“祛魅”,马克思主义者将会说的),威尔斯把他的历史描绘为一切国家、所有阶级、“整个人类所共有着的冒险”。⁵他公然宣称他的书不仅仅是关于普通人的,它是专为普通人的,普通读者的——作为证据,他引证道,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它售出了超过200万本。尽管绝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对威尔斯不屑一顾,正如他蔑视他们一样,但是他们不能无视他的著作或其论点。卡尔·贝克尔(他本人常常自称是一位新史学家)在《美国历史评论》上评述《世界史纲》时,坦言威尔斯的“新史学”就其体会而言是太新了,太执着于依据现在标准来判断过去——确切地说,按照威尔斯对未来的看法,当“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1] genetic method, 一译发生学模式。

[2] Poor Laws, 英国历史上陆续颁布的关于社会救济的法律。1601年颁布第1个重要的济贫法,授权治安法官以教区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征收济贫税及核发济贫,贫民须在其所在的教区居住一定年限后方可获得救济。该法奠定了英国济贫的基础。

[3] Methodism, 新教宗派之一,亦译卫理宗或循道宗。该宗是以创始人、英国神学家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卫理公会、循道公会等)的统称。

“世界联邦”[Federal World State]来临之际,未来将被引领入一个真正民主的且普遍的时代。⁶ 如果那一预言现在看起来是离奇有趣的,那么威尔斯的其他一些幻想已经实现了。在1900年,他提出了一份人类史学“计划书”,它将考虑到所有的社会变迁力量:生物的、人口的、地理的、经济的。后来,在其自传中,威尔斯说到,如果他是一个亿万富豪,他将设立“分析历史学教席”[Professorships of Analytic History],以资助新型的历史学家们——“人类生态学家们”[human ecologists]。⁷

正如已发生的,法国已经开始出现了新一代。《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于1929年,针锋相对于支配着学术机构的政治和外交史家们——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正如他们被蔑称的那样。当《年鉴》从斯特拉斯堡迁址巴黎的时候,那一绰号消去了些锋芒,在巴黎,它的编辑之一(马克·布洛赫)加入到巴黎大学教员行列,而另一位编辑(吕西安·费弗尔)则进入了法兰西学院。随着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之争后的逐步立足,年鉴作家们获得了一个有力的机构基础,在费尔南多·布罗代尔主编之下,杂志成了法国、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刊物。⁸ 它业已被证明是非常革新的。彻底超出了更为传统的经济与社会史形态,现在它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甚至符号学和语言学那里,得到了它的主题和它的方法。

当美国人已经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新史学模式——计量经济学和计量史学的,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女权主义者和性别的,精神分析的和民粹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也受到海外同行的许多影响。也许可以发现,一个规模庞大的历史学家代表团,每年或者是每个休假期都要去巴黎朝圣,以便从主人那里得到指示。其他人去英国寻求启示,特别是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后者的工作已经被用来强化激进史学的本土传统(以鲁宾逊的学生和同事查尔斯·A. 比尔德为代表)。因而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了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范式;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各类“原始叛逆者

[primitive rebels]”的概念被当作城区黑帮的原型;佩里·安德森的“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讨论的起点。

如果新史学,正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并非如它的某些年轻狂热者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新的,那它也亦非如它的批评家们假定的那样是旧史学。旧史学、传统史学,吸收并使其自身与新史学相适应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确实,即使在新史学出现之前,旧史学也从未像常规所认为的那样是同质的或过分简单化的。德国史学成功地既为布克哈特也为兰克,既为文化史也为政治的和“科学的”历史,留出了地方。英国的辉格史学,自伯克和麦考莱以来,涉入诸多范围和形式,包括一些值得注意的非辉格类型。他们的法国同道,甚至有着年鉴作家们都钦佩的一种精神上的宽宏和自由。新史学家们的抱怨之一是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抛弃了基佐、梯叶里和米什莱的宏大传统。伟大的美国经典也不只是政治编年史的。班克罗夫特的史学不仅是杰克逊民主政治的一曲赞歌;它也反映了他对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偏爱。帕克曼的“美国森林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orest];当他如是命名他的这部关于大西部[Great West]的著作的时候,⁹是与任何新史学家的著作一样,植根于人类学、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荒野,如同地中海是布罗代尔的英雄一样,无疑也是他的英雄。

因而,新史学比人们也许认为的要旧些,旧史学也并不是那么旧的。但是所谓的无可否认的新,是新史学的胜利。在历史学界,总体上,新史学现在是新的正统。这并不是说旧史学不再被书写了。政治的、宪政的、外交的、军事的和思想的历史继续被某些杰出的资深历史学家们,甚至是某些锐意进取的年轻历史学家们书写着。(尽管更常见的,是旧史学根据新的传统而被重新书写。从而,政治史被定量化、社会学化,思想史——观念研究——被转变为心态[*mentalité*]史——大众信仰与态度的研究。)然而旧史学,如

果不是完全被取代了,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是被移置了。昔日处于这一行中心的,而今身在边缘。过去所用来定义历史学的,今日则是历史学的一个注脚。

本着共同掌权的精神,一些历史学家(旧的与新的同样)争论道,全部这些都是有着微不足道的结论,只要是一种容忍的心态占着上风,只要每个历史学家能“做他自己的事”——或者,正如老话说的,“走他自己的路去天堂”。¹⁰其他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更为愤世嫉俗的态度,贬低新史学至今仍是另类的学术时尚,一旦新鲜感褪去,或者某些更为冒险的新人通过反叛他们的前辈来彰显他们自己的权威的时候,它就会消失殆尽(在学界,这被称作修正主义)。事实上,这股特殊的时尚已经幸存了好几代,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更不易改了。到如今,有了不知晓其他种类的史学且不能进行别种史学研究的历史学家——严肃的,名声显赫的,老资格的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而言,新史学已经失去了它那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承认对那一流派本身没有什么合法的批判,至多是对历史学本身。例如,对于论辩计量史有一种抬高方法于实质之上,允许用统计学来界定本学科的趋势,他们答复道,这与宪政史没有什么不同,后者是把它主题从所有的可资利用的文献中抽了出来。社会史被指斥为是很容易就不当地牵扯到日常生活的琐事,对此,他们通过指出构成诸多政治史的仍然是那单调乏味
7 的密谋作了回应。这一点,我们被告知,并非新史学或旧史学,而是好的历史学或坏的。

对此问题,这是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谁能拒绝对好的历史的诉求?谁能否认在旧史学中有许多坏的历史,而在新史学中有许多好的呢?谁会那么粗野,以致重挑起昔日的争端,并抵制着和睦相处的召唤呢?的确,谁呢?也许除了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发现那些观念不是那么容易调和一致的,那些重要的问题依然处于未被解决的危急关头,两种史学模式反映了与不同历史概念等价的
主题与方法上的差异,而且新史学有着重要的内涵,不仅对于

史学史,也同样对于观念史。

本书诸章论述新史学和旧史学的种种模式、方法或观点。它们证明了一种看起来似乎与“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单一性相矛盾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甚至也许看起来蔑视着标记“新”和“旧”。然而由于所有的多样性和限制条件都包含于它们之中,各种类别有着无可否认的现实性。它表现于普通用法中。“新史学”已经成为公认的缩略语,用于也许彼此间并不一致,但各自地且共同地都代表着对传统史学的一种挑战的史学模式。

仅仅因为新史学在今日学界中的支配地位(“霸权”,新史学家们将会说的),这一挑战就是严重的了。¹¹确实,处于支配地位这一事实,对本书论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得出如下观点:这一争端不在于新史学本身,毋宁说是它已经担当的那一决定性的角色,以及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提出的高傲的主张。没有任何人能——肯定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研究从1557年到1572年间巴黎民众的不安;或者从1887年到1895年间古巴的流浪汉、乞丐与盗匪;或者从1648年到1870年间中欧制造业中妇女的工作;或者18世纪哈布斯堡君主国中的身高和营养。但是正如近来发生的,当这些构成了并非《社会史杂志》而是《美国历史评论》的全部内容(书评除外)的时候,¹²并且当《评论》的编辑和编委会在这类文章中——的确,没有把它们认作从属于某个与众不同的派别——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的时候,人们也许会发现反思并关注的理由。

社会史,新史学的这一类别,是本书起始章节的主题。“撇开政治的历史”是几乎半个世纪前,G. M. 特里维廉描述社会史的方式。这一用语现在是被轻率地使用着,但是它特征化了一种史学模式:不是忽视了政治,就是把它放逐到“副现象”领域,或者认为只有当它已经被转化为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当那么一种史学自称是“总体”史,乃至历史学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和高级的形式的时候,个中内涵就是极为重要

的了——不仅仅对于史学著述,而且对于历史学家的既是政治之主题又是史学之主题的政治的 and 人的概念。

论“新史学”的这章聚焦于计量史学和心理史学,每一种都呈现出它自己的那种决定论和方法论问题。“两个民族或五个阶级”描述了在社会学史学中的一次操练,并且把这类史学的抽象性和样式,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的“道德想像”[moral imagination]相比较。“小组”[The “group”]论述的是颇具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它的共产党渊源,它的意识形态承诺与修正主义策略,它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及新史学的关系。

接下来诸章中的两篇文章分析了新史学特有的著作和主题。第一,讨论社会史,仔细考量了那一流派的两位奠基人的观点,并且反思它的当前状况。第二,展现两位第一流的英国思想家的心理史学诠释,他们起着该方法本身的个案研究的作用。第三,比较近来研究法国和英国的历史著作,判断新史学假定的受害者之一,叙述史学,也许依然没有像有时被宣称的那样不复存在了。

新史学的对照物,普遍被认为是“辉格史学”,后者显然在主题上是政治的,而在形式上是叙述的。“现在谁读麦考莱?”指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政治派系的历史学家,托利党徒[Tories]、激进派[Radicals],和辉格党徒[Whigs],共有着如下观点:人的历史首要的是他的政治遗产的故事,特别地,英国史是“自由主义谱系”的故事。“历史与进步观念”追溯了一个常常与辉格史学相关联,但实际上是一长串思想家们的特性的观念,这些思想家们在什么构成进步上意见不一,但都赞成某些进步概念通过把过去和现在、未来纳入到一个连续统中以赋予历史意义是必须的。“历史言之有理吗?”暗示着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不仅仅来自新史学:保守主义哲学家米歇尔·奥克肖特在这一点上是比尼采要更加激进的,而尼采比奥克肖特要更加辉格主义的;因为尼采的历史女神通过向我们现在所关切的言说懂得了过去,反之奥克肖特的历史女神则是一位因过去本身是死的而不能“言之有理”的被深深眷恋着的